



刘恒武 著

良渚文化

综合研究



良渚文化综合研究

刘恒武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良渚文化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繁荣程度处于中国大陆全域同时期史前文化的巅峰,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书在充分吸收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详细解读最新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良渚文化的变迁过程。

全书内容由9章构成,第1~3章论述了良渚文化研究的学术史、良渚文化分布区的环境特点以及良渚文化的地域区分与时段划分,第4~9章从良渚文化的随葬陶器、玉器、石器,高台墓地,祭祀遗迹以及区域文化比较等方面入手展开剖析,并且进一步针对良渚文化的社会阶层分化、聚落分布模式、地域社会统合、经济生业形态、祭祀礼仪轨制、聚落级差以及城市萌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渚文化综合研究/刘恒武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3-023796-5

I. 良… II. 刘… III. 良渚文化—研究 IV. K87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6326号

责任编辑:郝莎莎/责任校对:曾 茹/责任印制:赵德静

封面设计: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 000)

200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印数: 1—1 200

字数: 266 000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赵洪祝		
副 主 任:	夏宝龙	王国平	巴音朝鲁 李 强
	黄坤明	郑继伟	张 曦
成 员:	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 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钟桂松	陈 荣 林吕建
	郑仓元	童 健	胡祖光 梅新林
	许 江	邵占维	张金如 陈德荣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张鸿铭	陈荣高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陈永发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

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

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前 言

良渚文化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一，其繁荣程度处于中国大陆全域同时期史前文化的巅峰。凝缩于良渚玉器的礼制文化长期得以传承延续，并且浸入到了夏商周青铜文化的脊髓，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次，从世界文明史的视域来看，太湖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具有典型性，弄清该地区史前社会构造的进化机制，对于探讨人类早期社会演进的普遍规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迄今已有 70 余年，近年，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笔者不揣愚陋，从古环境、时段划分、随葬陶器、玉器、石器、高台墓地、祭祀遗迹以及区域文化关系等方面，系统考察了良渚文化的发展变迁过程，并且在此基础上针对学界普遍关注的良渚文化的社会阶层分化、聚落分布模式、祭祀礼仪形态以及城市萌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书首先对良渚文化研究的学术理路进行了梳理，将良渚文化考古探索的过程分作 20 世纪 30 年代、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80 年代后期至现在三个阶段，详细论述了各个时期良渚文化研究取得的进步与成果，同时分析了良渚文化研究当前面临的问题。

在分析探讨良渚文化的遗物、遗迹之前，本书先将考察的视点定格于良渚文化赖以生存繁荣的地理载体，并为自身的良渚文化综合研究建构起一个时空坐标。

本书论及的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环境问题包括：环太湖地区古海岸线变迁；古太湖及周围湖泊的状况；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古环境变迁、资源状况及其对农业的影响；良渚文化时期的环境特点与聚落形态及社会发展进程的关系。笔者认为，环太湖地区东、北、南三面为水域环绕，西部山地横亘，这种相对闭合的地理环境在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统合及聚落关系的阶序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此外，古河口湾的逐渐消退，为崧泽文化晚期以后太湖南侧湖州、余杭等地区的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展和聚落的发育提供了地理前提。关于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衰亡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环太湖各区域的环境条件不尽相同，不宜将良渚文化消亡的原因单纯归结为“洪灾”的破坏。

根据遗址空间集结的状况，本书将良渚文化分为四个分布区：余杭（太湖以南）、嘉兴—海宁（太湖东南）、上海—苏州（太湖以东）、常州—常熟（太湖以北）。以层位关系清晰的福泉山遗址资料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近年新发掘或新

发表的庙前、达泽庙、新地里、罗墩、庄桥坟等遗址考古资料，本书将良渚文化分为三期五段。另外，笔者认为，根据既有测年数据，良渚文化存续年代应为公元前 3200 ~ 前 2200 年。

本书遗物研究由陶器、玉器和石器三个部分组成。陶器研究以随葬陶器的变迁及其地区差异的考察为重点；玉器研究部分主要探讨了良渚玉器系统整体的时代变迁以及良渚玉器的区域流通状况；石器研究的章节则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系统分作传统石器和新生石器两个板块分别进行了论述。

在陶器研究中，笔者通过针对随葬陶器器种、组合、形制的时期变化及其地域特征的分析考察指出，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周边全域文化的统合程度不断加强，但地域间差异仍然持久存续。

崧泽文化晚期，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不同区域陶器特征的差异还相当显著。到了良渚文化早期，环太湖地区陶器形制及装饰的一体化倾向更加突出，夹砂鱼鳍足鼎、双鼻壶开始出现于太湖周边全域。另一方面，陶器种类、型式新旧杂陈，特别是壶罐类陶器的变型依然丰富，随葬陶器组合的地域性差别也比较明显。进入良渚文化中期以后，鼎、豆、双鼻壶、罐等主要器种在型式上趋于单一，在形制风格上走向统一。夹砂鱼鳍足鼎及其衍生器式——丁字形足鼎先后风行太湖周边全域，在随葬陶器组合中涤除、排挤了其他鼎式，弦纹镂孔饰圈足豆亦成为陶豆的大宗，以苏州—上海地区为主要分布地的带流器开始向嘉兴—海宁地区蔓延，而作为余杭地域性随葬器物的夹砂圈足罐也向嘉兴—海宁地区扩散。环太湖各地随葬陶器相似度的提高，反映出地域间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良渚中期随葬陶器配组中的器种选择的地域差异，则充分表明了地域传统的强固与恒久。良渚文化晚期，各地区鼎、豆、双鼻壶、带流器等主流陶器的形制继续表现出很大一致性。嘉兴—海宁地区随葬陶器的器种选择与苏州—上海地区更加趋近。此外，良渚文化末期“广富林遗存”陶器的存在值得注意，这一异质文化因素在环太湖地区的嵌入与扩张，与良渚文化的终焉或许存在某种联系。

就良渚文化玉器的变迁与流通而言，首先，在良渚文化玉器系统诞生之前的崧泽文化晚期，环太湖地区的玉器文化对宁镇地区和薛家岗文化分布区的玉器文化表现出很大的依附性，而且，玉器的社会分配与利用的阶层色彩并不浓厚。至良渚文化早期，尽管环太湖地区的玉器文化依然保留了大量崧泽文化时期的传统，仍旧受到周围玉器文化的很大影响，但以玉琮、冠状器、龙首牌饰为代表的新因素意味着环太湖地区玉器系统主体性的萌发，而罗墩、张陵山、达泽庙三地兽面（龙首）纹的出现则反映出环太湖地区共有宗教观念的形成。此外，伴随着良渚文化玉器系统的萌生，玉器随葬开始显示出明显的阶层性，可以说，良渚文化玉器系统的形成过程与环太湖地区社会阶层分化的进程是齐行并进的。良渚文化中期，太湖周边地区的玉器利用和制作达到空前昌盛，良渚文化各地域、各

聚落的玉器流通以权力核心集团控制的阶序性分配方式展开。集中制作并按阶序原则分配流通的玉礼器,成为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威得以物质化和现实化的道具。良渚文化晚期,良渚玉器的繁荣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持续,其制作与流通的中心则移至太湖以北。另外,随着良渚文化晚期良渚玉器的跨区域扩散,凝缩于良渚玉器之中的社会法则及其践行规范逐渐脱却了地域的狭隘性,成为涵育中国早期礼制文明的宝贵资源。

本书将良渚文化石器分为传统石器和新生石器两大类。石犁、石镰、耘田器等最为重要的新式石质农具起源于崧泽文化晚期,这表明环太湖地区稻作技术革新发生在良渚文化时期之前。然而,陶器、玉器所反映的环太湖地区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实质性变化则始于良渚文化早期。一系列新式石器既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引擎,也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物证,环太湖地区石器系统的变革不仅导致了物质文化的新旧更替,而且也为精神文化的更新、社会组织的重构提供了物质前提。

遗迹研究是以往良渚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笔者认为,良渚文化高台基地和祭祀遗迹的考察,是探讨聚落的空间分布、劳动力的动员状况、社会阶层化进展以及宗教活动的组织化等问题的重要途径。

高台基地系大型人工建造物,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劳动力流向,另一方面可以显示聚落的空间分布模式。但是,以高台基地资料为主要依据的聚落分布研究,必须将高台基地共时性的考察作为前提,而高台基地的共时性研究则需探明两个问题:土台堆积或营造的持续时段;土台作为墓地利用的持续时段。从高台基地资料可以看出,良渚文化早期,局域性的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等级分化趋于明显,良渚文化中期以降,聚落级差进一步扩大,环太湖地区出现了辐射良渚文化全域的大型中心聚落。与这个过程相始终,聚落内部的阶层分化也日益显著。

根据目前考古资料,环太湖地区时代最早的祭祀性遗迹为崧泽文化早期遗存,“祭台”之类祭祀设施的发现,意味着固定化、专门化的礼仪空间在当时业已存在。良渚文化的祭祀遗迹较之崧泽文化时期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规模趋大,这反映出良渚文化时期祭祀活动的兴盛。在良渚文化早期,大规模祭祀设施主要分布于苏州—上海地区。进入中期,新的大型祭祀设施的营建集中于余杭地区的良渚遗迹群。至良渚文化晚期,新出现的大型祭祀设施数量不多,其中,寺墩与福泉山两遗址的晚期祭坛在规模和形制上引人注目。毋庸置疑,宗教性、礼仪性设施的大量营筑,是以生产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为物质前提的,但是还应指出,大规模宗教设施的营筑,并非伴随物质条件的改善而自然发生的现象,它同时也是社会集团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集团间关系调整的产物。首先,社会分层带来的社会集团内部的对立,使得一种与之适应的新意识形态的产生成为必然。这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从宗教层面上证明特权阶层领导地位拥有无可置疑的正

当性，通过礼仪性设施的营筑、威信物品的制作和分配，特权阶层得以操控宗教行为、主导祭祀活动，进而达到使既有权力正当化的目的。

在有关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太湖地区与周围地区考古学文化关系的考察中，本书将关注的重点置于海岱地区和宁绍地区。其中，环太湖地区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关系的探讨以大口尊的比较研究为主线展开。笔者认为，环太湖地区和海岱地区史前大口尊形制演变脉络表现出明显的近似性和同步性。就大口尊的功用而言，环太湖地区的大口尊至良渚文化中期已经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礼器，而海岱地区大口尊的礼器化则仅在莒县及新沂等局部区域大汶口文化晚期得以实现。虽然海岱地区各地都发现有大口尊随葬于高规格大墓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口尊已经完成了向普遍性礼器的转变。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反映出环太湖地区与海岱地区各地之间文化互动的非均衡性，环太湖地区与海岱地区北部各地之间的联系实质上仅仅停留于表层，而它与苏北及鲁东南之间的关系则已深入到精神的、观念的层面。

就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地区的区域文化关系而论，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虽然河姆渡后续文化的陶器与石器系统接受了大量良渚文化的要素，但是河姆渡文化以来形成的以夹炭陶、绳纹釜为代表的宁绍地区史前文化固有传统的依然顽强延续。此外，玉礼器、高台墓地、祭坛等良渚文化标志性遗存也很少见于河姆渡后续文化遗址，从社会组织方式、仪礼系统复杂化程度等非物质性层面来讲，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后续文化仍然游离于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范畴之外。

本书结尾讨论了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社会形态，笔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已经处于前文明时代的顶点。随葬陶器、玉器、石器、高台墓地、祭祀遗迹等方面的具体研究所勾勒的良渚社会表现出四个显著特征：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专业集团的出现；聚落级差的扩大；城市的萌芽。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良渚遗址群反映出良渚文化聚落级差的极端化，该遗址群所映现出来的人类生活空间已经超越了一般聚落的范畴，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城市。城市萌芽是环太湖地区聚落级差扩大程度的标志性结果，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本身也蕴含了城市萌芽的催生力量。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注意吸纳近十多年来国外学者在良渚文化环境变迁、石器、玉器等专题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同时借鉴西方人类考古学、社会考古学理论，对既有考古材料进行审视与思考。遗物研究方面，强调对于各类器物系统整体变迁轨迹的把握，并力图洞察器物系统演进过程背后潜藏的生产技术、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层面的时代变化。遗迹研究方面，选取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高台墓地、祭祀遗迹两个遗迹种类，尝试通过周详的比较分析，就良渚文化的聚落空间分布、聚落间关系以及宗教礼仪形态等问题展开探讨。囿于笔者学力浅薄，本书虽曰“综合研究”，最终却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仅能就上文提及的若干论题，写下自己的所识所见与所思所悟。

目 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前言

第一章 良渚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
第一节 良渚文化研究史	(1)
第二节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1)
第二章 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自然环境	(13)
第一节 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海岸线	(13)
第二节 良渚文化时期的太湖及其周围的湖泊	(19)
第三节 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古环境变迁、资源状况及其对农 业的影响	(21)
第四节 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环境特点与聚落形态及社会发展 进程的关系	(26)
第三章 良渚文化的时空坐标	(30)
第一节 空间划分	(30)
第二节 时间坐标的横轴——期段划分	(35)
第三节 时间坐标的纵轴——绝对年代	(41)
第四章 良渚文化随葬陶器的变迁及其地区差异	(44)
第一节 崧泽文化晚期太湖周边各地的随葬陶器	(44)
第二节 良渚文化早期太湖周边各地的随葬陶器	(49)
第三节 良渚文化中期太湖周边各地的随葬陶器	(52)
第四节 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周边各地的随葬陶器	(57)
小结	(60)
第五章 良渚文化玉器的时代变迁与地域流通	(62)
第一节 良渚文化玉器系统诞生之前——崧泽文化晚期玉器	(62)

第二节 新体系的萌芽——良渚文化早期玉器	(69)
第三节 繁荣与流通——良渚文化中期玉器	(75)
第四节 嬗变与扩散——良渚文化晚期玉器	(83)
小结	(87)
第六章 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系统的变革	(89)
第一节 传统石器的存续与演变	(89)
第二节 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期的新生石器	(95)
第七章 良渚文化的高台墓地与祭祀遗迹	(100)
第一节 高台墓地及祭祀遗迹的分布和年代	(102)
第二节 高台墓地及祭祀遗迹的营造状况和存在形态	(113)
第三节 高台墓地、祭祀遗迹与聚落分布模式	(126)
第四节 高台墓地和祭祀遗迹反映出的良渚社会等级分化与观念形态	(129)
第八章 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太湖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考古 学文化关系	(132)
第一节 环太湖地区与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交流——以大 口尊的比较研究为中心	(132)
第二节 良渚文化与杭州湾南岸河姆渡后续文化的关系	(152)
第九章 文明前的文明——关于良渚文化社会状况的探讨	(158)
第一节 良渚社会的阶层化	(159)
第二节 社会分工的复杂化	(160)
第三节 良渚文化的聚落级差	(161)
第四节 城市的萌芽	(165)
小结	(169)
附表	(170)
主要参考论著目录	(193)
后记	(205)
Abstract	(207)
日本語要旨	(212)

Contents

Preface

Chapter 1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Liangzhu Culture research	(1)
1. 1	Academic history of Liangzhu Culture research	(1)
1. 2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of Liangzhu Culture	(11)
Chapter 2	A study on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aihu region in Liangzhu Culture age	(13)
2. 1	Coastline of Taihu region in Liangzhu Culture age	(13)
2. 2	Taihu Lake and other lakes near Taihu in Liangzhu Culture age	(19)
2. 3	Environmental changes, resource cond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agriculture in Taihu region of Liangzhu Culture age	(21)
2. 4	Influences of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ttlement and society of Liangzhu Culture	(26)
Chapter 3	Coordinate of the time and space of Liangzhu Culture	(30)
3. 1	Distribution of Liangzhu Culture	(30)
3. 2	Stage division of Liangzhu Culture	(35)
3. 3	Dating of Liangzhu Culture	(41)
Chapter 4	Transitions and sub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rial pottery in Liangzhu Culture	(44)
4. 1	Burial pottery of the late Songze Culture	(44)
4. 2	Burial pottery of the early Liangzhu Culture	(49)
4. 3	Burial pottery of the middle Liangzhu Culture	(52)
4. 4	Burial pottery of the late Liangzhu Culture	(57)
	Conclusion	(60)
Chapter 5	Transition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jade ware in Liangzhu Culture	(62)
5. 1	Jade ware in Taihu region before the birth of the jade ware system of	

Liangzhu Culture——Jade ware of the late Songze Culture	(62)
5.2 Germ of the jade ware system of Liangzhu Culture——Jade ware of the early Liangzhu Culture	(69)
5.3 Prosperity and distribution——Jade ware of the middle Liangzhu Culture	(75)
5.4 Transition and spread——Jade ware of the late Liangzhu Culture	(83)
Conclusion	(87)
Chapter 6 Reforming of the stone tool system of Taihu region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89)
6.1 Continuance of the traditional stone tools of Taihu region	(89)
6.2 New-type stone tools appearing from the late Songze Culture to Liangzhu Culture	(95)
Chapter 7 Burial mounds and ritual remains in Liangzhu Culture	(100)
7.1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date of Burial mounds and ritual remains in Liangzhu Culture	(102)
7.2 Construction and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of the burial mounds and ritual remains	(113)
7.3 Pattern of the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of Liangzhu Culture reflected by the burial mounds and ritual remains	(126)
7.4 Stratification and religious ideology of Liangzhu society viewed from the burial mounds and ritual remains	(129)
Chapter 8 Relationship of Taihu region with other regions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132)
8.1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aihu region and Hai-dai region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132)
8.2 Relationship between Liangzhu Culture and Post Hemudu Culture	(152)
Chapter 9 A research on the conditions of Liangzhu society	(158)
9.1 Stratification of Liangzhu society	(159)
9.2 Division of labor of Liangzhu society	(160)
9.3 Settlement hierarchy of Liangzhu society	(161)
9.4 Germinating of urbanization	(165)
Conclusion	(169)